

## 何國忠散文選 (1985-88)

### 【導 讀】

何國忠 (1963-)，出生於柔佛州居鑾市。高中畢業後，原本考取台灣大學，後來因故放棄赴台留學，選擇離家較近的馬大。一九八四年七月，何國忠進入馬來亞大學就讀，他非但沒有感受到葉寧和瘦子在散文裡建構的烏托邦，他還選擇了公認最沒出息的中文系。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選擇，卻是日後馬華校園散文的分水嶺——葉、瘦二人寫的是大學的生活內容和趣聞，何國忠筆下盡是狼煙四起的生存，校園散文自此區隔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敘述視野。

入學不久，何國忠發表了〈消逝了的似青山還在〉(1985.01)，大略回顧中學時期的學習和思維。這個一度沉醉在純文學天地，並高度崇拜胡適的小子，很快便發覺馬大中文系遠比想像中複雜，除了文學，還得直接面對大馬的族群政治。他的校園生活，打從出席馬大華文學會籌委會的常年大會開始，便沉重起來。暫且不談籌創華文學會的政治壓力，單是華社施加的「文化使命」之重擔，就讓人吃不消。

〈讀中文系的小子〉(1985.10)可說是所有中文系學生的命運縮影，文中有兩段對白，道盡中文人的一切辛酸：「實在很佩服你，的確應該有人為中華文化的延續而努力，我當初也很想單主修這個系的課程，但始終沒有這份勇氣」；「中文系讀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報紙的報導說是以國語教學的，是不是那樣子？中文系學生的出路是不是只能當個中學教師？」這一小撮理想份子，長年遭受馬華功利社會的貶抑、在校內活動受制於大學法、中文系部分課程得用馬來語（國語）授課、中國文學的學位論文不能以中文撰述，卻得承擔「為中華文化而努力」的大任。其實他們只是一批華社與華人文化自衛機制裡的祭祀品。食之乏味，棄之不可。

〈殘存記憶中的騰躍〉（1987.07）完整記述了何國忠籌辦華文學會的心路歷程，以及一個文化人格的形成。華文學會的孕育與誕生，以及其存在之價值，恐怕只有那一代人才能夠深刻體會。校園散文發展至此，完全轉型，它向華社披露了殘酷的真相與生存危機。如果把馬大看作大馬現實社會的縮影，那麼馬大中文系則是大馬華人知識份子處境的縮影。

何國忠的創作質量相當可觀，同期的散文還有〈在香港的最後一夜〉（1985）、〈疏忽了的關心〉（1987.8）、〈疲憊的心靈〉（1987.9）、〈苦澀的歲月〉（1987.10）等多篇，前者寫方娥真，後三篇則是對華社的困境提出一些省思，他發現很多問題老是在（民族性的）短視裡，惡性循環。這群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被迫早熟的華裔大學生，在巫裔居多的大學環境中，再多的奮鬥也是徒然的。他們只是年復一年的，輪流擔任唐吉科德（Don Quixote），對抗那座永遠不損分毫的巨大風車。

〈只緣身在此山中〉（1988.04）是念碩士班的時候，回顧四年來在中文系的總體感受，身為馬大中文人，始終是無悔的。但馬大數十年來，究竟培養出幾個具有浪漫主義騎士精神的文化人呢？所謂的「使命感」，能夠維繫多少個世代的創作意志呢？

本卷所選的六篇散文，全部來自《班荇谷燈影》（吉隆坡：澤吟

書坊，1989；吉隆坡：十方，1995），這是校園散文從輕轉重的里程碑，它開啟了另一種文化書寫的角度，具有華文文化的承擔意識、以文化人自詡的敘述風格。何國忠的文字，很能夠將現實環境的壓力轉存到敘述節奏當中，不急不徐，每個環節和問題的陳述都相當流暢清晰，逐步逼近文化散文與社論的疆界，但始終保持散文的語言質地，沒有失控。

五年後出版的散文集《塔里塔外》（吉隆坡：十方，1995），關懷層面更為寬廣，很自然地提高了文化／文學批評的成份，從中文系的文化使命感、馬華文學的省察，到華文國小的國文問題等等。那是一部脫離了校園主題，跨足到文化現象批評層面的學院散文。近年出版的《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陽，2002），則是何國忠以文化人／學者視野撰述的一部隨筆式的散文集，可以看作校園散文最後、最成熟的演進類型之一。文化激情終究得沉澱下來，冷靜地面對這個對文學與文化非常不友善的世界。

何國忠取得中文碩士學位之後，繼續在該系修讀博士，後赴英深造，考獲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博士學位。曾任馬來亞大學東亞系副教授兼系主任。現任馬大中國研究所主任。除了散文，另著有文化評論集《今我來思》（1993）、學術論文集《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2002），並主編《馬大散文集》、《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中華文化之路》、《社會變遷與文化詮釋》等書。

## 消逝了的似青山還在

歲末年初的天氣最是多風，那樣的天氣令人心情平靜愉快。那一年我剛考完試，正在等成績。原本我是希望能借這段時間到大城市闖蕩一下，最好能當一名記者。在山城住了那麼久，我渴望能到一個比較有挑戰性的地方，磨練自己。但爲什麼會選擇到那個小鎮工作呢？一時也說不上來，反正收到教育部的通知書後，考慮了一會，第二天一早我就奔往那兒去。

那真是一個令人懷念的地方。雖然不論怎樣看，它只是一個平凡的小鎮，裡頭住了幾百戶人家，除此以外值得著筆的地方實在不多，假如說它有什麼特別，最多也只不過因爲它是柔佛州唯一的錫產區。說來遺憾，我到那個地方去的時候，看到的只是殘遺下的礦湖。開採錫礦，那已經屬於好遠好遠的事了。但這都無關緊要，反正我還是懷念那兒，懷念那兒的人和事。就好像到一個地方旅遊，事後會不會令人回憶，景色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是你和誰同住，那些人是不是你的知心好友。

先說一說我的一些故事。打從高中以後，我就很少主動去結交新朋友。我一直以爲，朋友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只要一兩位知心的便已足夠，假如能像白先勇那樣，有一位如歐陽子的人那樣地了解自己，相信死已無憾。太多的朋友肯定沒有好處，那會令你浪費許多時間在寒暄與應酬上。我時常都會想起李敖說胡適假如不浪費那麼多的時間在應酬上，那他的學術生命將會更燦爛。當時我已決定

將來要走學術的路，故常常以李敖的這一番話來警惕自己，現在想來實在有點好笑。當時我甚至以為孤獨更能激勵創作，所以就在四周築起了一道道的圍牆。為什麼有那樣奇怪的想法？一時也不甚了了，但是那一段日子，我真的孤獨起來。

但後來我終於改變了我的想法，就在那個我懷念的地方，我一到那兒的時候，迎接我的是一片片避也避不開的溫馨友情。那群朋友的爽朗、健談、和藹與快樂的笑聲，深深地影響了我。我開始知道友情的珍貴，也了解到要怎樣才能令自己快樂。有什麼比快樂更重要呢？我開始回復初中時快樂的個性，話說得特別多，笑也特別多，整天蹦蹦跳跳，興起時還會哼幾首歌曲。初中時我是那樣子的，我原來的個性也是那樣子，但高中時我卻變了另一個樣子，不只因為自找孤獨，而且那時我還極端地崇拜胡適。那時候我也喜歡楊牧、李敖和張系國，但只有胡適的做人方式深深地影響了我，我甚至將他當作我人生的典範。胡適的老成持重是出了名的，為了學他，我只好盡力壓抑自己的個性，不愛言笑，每天裝著老成持重成熟的樣子，做個不像大人的大人。那樣的生活我居然也過了好一段日子。

但到了那所小學校後，我終於回復了愛說笑話的天真。那兒的朋友不止一個說過我可愛，又說我看起來很小，喚我小弟弟，我也不以為意。我記得阿南臨走的時候突然對我說，我的到來，帶給他很多快樂。事後我追憶起來，為何說我帶給他很多快樂，為什麼不說那兒的一班朋友給我很多快樂呢？阿南在那個小鎮教了三年，最後為了深造而不得不離開那個圈圈，那真的很令人傷感。但很快的，又有一位新的女教師來到，圈圈依舊圈圈，笑聲依舊笑聲，永遠綿延不絕。

那真是一個令人懷念的地方，在那兒我的心情永遠都是愉快

的，脾氣因此也變得出奇的好。那兒的朋友常說我沒有脾氣，教書的朋友常會因學生的調皮不專心而生氣，可我就生氣不起來。這可能是受了李敖的〈我的殷海光〉裡頭的一段話所影響，殷海光患胃癌將不久人世的時候，李敖勸他不要難過：「讀了那麼多書，若連生死都看不破的話，那書也是白讀了。」年輕的時候，我囫圇吞棗了許多書，有沒有消化是另外一回事，但文學和哲學書籍畢竟讀了很多。生死也許我還無法看得開，但小事若也看不開要生氣，那書真的是白讀了。而且，我也不要學王文興《家變》裡的范曄一樣，白天發脾氣責罵父親，到深夜時才來暗自懺悔，那又何苦？不過，那時的好脾氣可能與這些都無關，而是那段日子的心情特別愉快。因為以前在家的時候，母親就常說我的脾氣很暴躁。

那真是一個令人懷念的地方。忘了告訴你，那個地方叫做三板頭，據說以前本來叫舢舨頭的，有個擺渡的河口，後來為什麼叫三板頭，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我教的學校叫「仁鑾」，那學校不大，只有五百多名學生。早上我教書，我知道，即使多麼認真，但因為缺乏經驗，相信教得也好不到那裡去。我時常會去想我以前的老師如何教我，以作參考。我記得我的老師們對我都很好，所以我的小學生涯很快樂。我希望我的學生也一樣。小學時我的功課雖然不錯，但考試過後仍能記在腦子裡的似乎不多，但有一些事到現在還深深刻在腦海裡，好像老師們上課時為我們講的故事，包括徐文長、三國演義、項羽、劉邦、岳飛等，現在還記憶猶新。那時候我聽故事時最快樂了，而我的學生好像也和我一樣愛聽故事，於是我盡力抽出時間為他們講了一個又一個，終於我有機會真正地讀完施耐庵的《水滸傳》和抱甕老人所選的《今古奇觀》。

早上我教書，下午的時候我教一些補習，傍晚時分就訓練學校

的籃球隊。六年級學生較大，於是對他們就像哥哥對弟弟般，因此他們不怕我，有的時候他們練得雜亂無章，我大吼一聲，他們當耳邊風。幸虧最後他們爲我爭了個全縣冠軍回來，但那時我已遠在吉隆坡，不再是他們的老師。

那兒的老師一共有十七位，住宿舍的共有九位，都很年輕。傍晚時分，大家一起打乒乓、打羽球、也打籃球。假如那時恰巧有一陣風吹來，那笑聲必當飄揚在風裡。

那真的是一段很美麗的時光，晚上我們坐在休息室聊天看電視批改學生作業。夜了的時候，偶爾會到半里外的馬來檔<sup>\*</sup>吃宵夜，九位老師卻只有兩輛電單車，於是只好載了一趟又一趟，的確有點麻煩，但是大家就是樂此不疲。

有時傍晚時分，打完球坐在草地上，抬頭望向天邊的雲彩，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想，何必一味要追求石破天驚，只要快樂，生活平淡一些又何妨？但是半年以後，我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我還是走了。那一天，我照了很多相，希望能將最美麗的時光留住。臨走的時候，正好下著雨，我撐著傘頻頻回頭。真的是「小風疏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

「留不住的若綠水長流，消逝了的似青山還在。」我一定會回去的。坐在巴士上，我一直不停地想。

[<sup>\*</sup>編者註]：馬來檔，即馬來人開設的小吃攤或小吃店。攤位，在廣東話裡稱作「檔口」。

## 在香港的最後一夜

——致方娥真

從台北乘馬航班機抵達香港的時候，一到旅店，羅長風就立刻聯絡你們，雖然事先已經約好，但我們就是無法通過電話聯絡上。到了第二天，長風打了將近十個電話，想遍你們可能去的地方，甚至在凌晨二時也曾打電話到你們的住所去，然而聽到的仍然是留聲機傳出來的聲音。等到我們猜測恐怕無法在這次的香港之行裡會見你們的時候，你們的電話偏偏在那時到來，約我們在九龍的假日酒店裡共進晚餐。那是我們在香港的最後一夜。彼時我們已經走完該去的地方，包括一些旅遊勝地，好比海洋公園、宋城等。在台灣十日，香港四日，我們其實已經有一種意興闌珊的感覺，怎麼也沒想到你們會在那時為我們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夜晚。

那是我第一次遇見你，雖然你和溫瑞安的名字在馬新都很有名，但說來很抱歉，你們的書其實我讀過的並不很多。不過，你們晚近在本地報章上所發表的文章，我幾乎都有注意到。我家裡有一本陳慧樺編的《大學生散文集》，裡頭收錄了你的幾篇散文。從那些散文以及你最近的文章，特別是那篇描繪你四個月牢獄生活的〈獄中行〉，我已經可以領會到為什麼人家說你的文章輕盈清淡，人間而不人煙。我相信你的確是才情縱橫。捧場話也許你已經聽過很多，我始終不能免俗。羅大佑、張系國都不約而同說人一過三十，所說

的話很多都不足信，我二十剛出頭，但即使我已年過三十，我相信你仍然會知道我所說的都是由衷之言。

見到你的那夜，才知曉你剛出院只不過兩天，身體還相當虛弱。瑞安說你一向不喜歡應酬，惟我怎麼也想不到你會為我們這群素未謀面、也不相識的朋友抱病赴會。我細細思量，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來自同樣一個地方，所愛的、所認同的都是同一片土地，也同時有一個近乎相似的理想。從你們的談話之中，我體會到你們對馬華文壇的關心及對馬來西亞的眷戀，所以當你們說雖然擁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權，但始終都不會放棄馬來西亞國籍的時候，我心中已不會再存有任何的驚奇或懷疑。

香港的天氣比台灣暖和很多，但我們仍得穿著厚厚的皮夾克抵禦攝氏十九度的寒冷。不過那夜的相聚，我知道，早已沖去了一切寒意。我們四名訪客之中，除了林江楫和溫瑞安有過一面之緣外，餘者可說都是陌生客。羅長風正為一本雜誌作人物專訪，所以初時說話最多的就是他和瑞安，講的主要也是環繞在你們的一些近況。曉峰、江楫和我說得不多，不過偶爾也會插嘴，而你可能因病的關係，只在旁邊專注聆聽，甚少發言。初時我是有點擔心這個談話會很快就變得無話可說，或者會變成純粹的「採訪式」交談，像某一個雨夜在台北時我們和胡金銓太太鍾玲的一席談話那樣。想不到最後我們和你們愈談愈融洽，笑聲也愈來愈多，而你無顧身體的虛弱，也跟著言多了起來。等到我們吃完晚餐到驪貞酒店小坐時，彼時我們和你們彷彿已變成相交多年的老友，變得幾乎可以無所不談了。

在赴會之前的一個晚上，我曾經在旅店裡讀了一本有關大陸台灣兩地坐牢故事的書，那是我們的團體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時我無意中買到的。你的〈獄中行〉也被收錄在裡頭。書中的每一篇文章，

幾乎都是對專政的控訴，將滿腹的血淚傾訴於紙上，讀來的確讓人覺得天下不平之事實太多了。我思索良久，發覺你的文章顯得很特別。我那樣說，是因為除了看到你寫說你是冤枉坐牢以外，我幾乎無法在你文章中找到任何帶有怨意的句子，也沒有聽到你責怪那些陷害你們的朋友。我難以相信有人受了冤獄心中仍會那樣的平靜樂觀，況且你外表看起來又是那麼的虛弱。也許你早已看開了，又也許你真的認為那四個月的牢獄生活很珍貴，誠如你所說的，換來一大堆生死掙扎的經歷，實在是一百萬元也買不到。晚近在你的文章裡，你也絕口不提那些令你痛心的人和事。你寬闊的胸襟及你堅強的意志，不由得我不佩服。

在驪貞酒店裡，瑞安告訴我們經過浩劫以後你們初到香港的情形，很多朋友忽然一下子都變成陌路人，的確讓你們嘗盡了人間的人情冷暖，我可以想像得到瑞安當時拿每千字港幣五元稿費的那種心情。到今天瑞安憑寫作而有能力在香港購買房子，我深深了解到這過程並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的。

等我說到曾經讀過你專訪胡茵夢及侯德建的兩篇文章時，你彷彿很高興，隨即轉頭告訴坐在你旁邊的瑞安。我心下不免有點驚奇，喜歡讀你文章的讀者可說不計其數，況且你的一首詩還被收錄在台灣南部中學的華文教科書裡，所以我實在有點驚異你仍然會因我讀過你的文章而感興奮。你專訪胡茵夢的那篇文章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因為除了報導以外，你還間接地為李敖說了一些話。李敖因錢財糾紛被蕭孟能控告而坐牢六個月的時候，報紙大登特登。可是在李敖出獄後上訴平反而在此案件中獲勝時，報紙卻隻字不提。我一直為這件事憤憤不平，不是因為我喜歡李敖的文章，而是關係到整個新聞界對於新聞的取捨標準。李敖為了這件事幾乎鬧得身敗名

裂，我從來沒有想到新聞界也會那樣不公平。

說到不平之事，我們不知不覺扯到《百姓半月刊》主編胡菊人那兒去。我一直以為香港嚴肅的作家中，胡菊人是生活得比較好的一位，但那一席談話之後，我才知曉胡菊人以前在《明報月刊》工作時，功勞雖大，可是薪水始終停留在馬幣幾百元之間。胡菊人一直以來都為天下不平事而鳴，我坦誠說出自己的心願，希望你也能為胡菊人做一個專訪，為他以前所遇到的不平事而鳴。你欣然答應，但我知道當涉及到一些人物時，有些事實是在難以下筆的。

凌晨一時的時候，我們六人告別驪貞酒店，瑞安和你帶我們到海邊散步，十九度的寒冷，加上海風的吹襲，我毫不提防地打了個冷顫。長風問及你和溫瑞安之事，你笑而不答。李敖有一名叫劉會雲的紅粉知己，瑞安則有你這位紅粉知己。不管將來怎樣，你們都叫我羨慕，也希望自己能有這種類似高山流水的際遇。但人海茫茫，一切一切只能學那短命的中國詩人那樣說「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啊！

於是我們的談話就開始漸漸地進入尾聲，我們乘德士由九龍過海底隧道到香港島去吃火鍋。香港的確是不折不扣的不夜城，凌晨二時還是有那麼多的德士在街道上川行，凌晨二時，飲食店的生意還是那麼的好。

你們說香港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城市，這些我們在香港的四日之行裡已可看出；你們說就連許多文人也是那樣子，我們就不免有點詫異了。不曉得當一些編輯知道我們拼命刊登香港文人的文章，而這些文人之中卻有人稱馬來西亞的人為土人時，他們心裡會怎麼想。是否仍然繼續將園地讓給他們而放棄本地文人的稿不用。去國十四日，遇到的許多事令我感觸深深。我開始關心起馬華文藝，我

開始知道馬華文壇需要努力的重要和必要，我知道我們非得站起來不可。

已是凌晨四時，該說再見了。乘德士回酒店的時候，我望向窗外，彼時的香港街道依舊是燈火輝煌，霓虹燈處處。我暗自思忖希望自己也能像你們那樣，永遠都保有年輕而雄熱的心。

## 讀中文系的小子

上完這學期的最後一堂文字學後，他和同學們走到「大學樓」去喝茶敘別。雨剛停後不久，路上還是很濕漉。也許是因為雨的關係，很多同學都沒有來上課。更或許是最後一天，同學按捺不住懷鄉的情緒，乾脆連最後一堂課也不上了。趕著預定的班車，儘早的回到半島的各個方向，或許是東部，或許是南部，也或許是北部，更或許是南中國海另一端的那一片土地。

「大學樓」裡稀稀落落的坐了幾個人，邊喝邊談的。有人呷了口咖啡，輕嘆一聲：好快，一個學期又過去了。

真的是好快，年紀越長，對於時間的飛逝更覺敏感，他常常有那一種感覺，能夠揮霍的年輕日子、能夠無憂無掛，盡情哈哈大笑的歲月似乎是越來越少了。日子的確跑得很快。只記得當年他獨自一人背著簡單行囊，乘著北上的列車從南部一個小小的鄉鎮走入了這個全國最大的都市，然後在這都市西部一個被一些人叫為象牙塔的地方暫時落草。那的確是一個美麗清幽的園地，但對許多人來說，它只是一個驛站，三年一過，那時鴻飛冥冥，他知道他又得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復計東西了。時間的飛逝，不管怎樣感嘆，它的前進是必然的。他只記得那一年他背著一個簡單的行囊，滿懷著理想和憧憬走進這個園地的時候，他告訴自己，假如真有「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的故事，那雲雨必定出自這兒，此外別無他覓。鴻雁踏雪泥的時候會留下幾許爪痕，他知道這地方必然會為他的生命留下

一個不可磨滅的足印。

日復一日走在異鄉的道路，如今，在這片小園地裡，他已走過了一半的路程，還有一半的路程等著他去走。他讀過胡適部份的大學日記，在未真正進入社會時，胡適真的做了許多準備的工作，因此他常常以胡適的大學日記作為他大學生活的典範。雖然在大學裡只不過一年半的時間，可是他常常會忍不住地，去緬思他在這一段日子裡的所獲所得。他無法不去思考，在高一的時候他讀了吳祥輝的《拒絕聯考的小子》，這本書令他的思想起了極大的衝擊，這本書激發了他思考的潛能。那一年有一個滿臉稚氣的少年對自己說，他絕對不會拒絕考試，他的志向使他認為進大學是必要的。他進大學絕對不是因為別人都想進來，所以他也跟著進來，反正跟著社會的價值觀念走絕對不會錯誤。不，不是的，那不是他所想的。最大的原因是他知道在大學裡他有機會好好地靜下來讀一些他想要讀的書，接受講師教授們的薰陶，他知道在大學裡他會學到許多思考訓練的方法。於是在那個炎熱的午後，他問了許多人，終於找到校園的門口，終於他滿臉興奮地走了進來。

這一年半的行程，該怎麼說呢？彷彿學到了許多，又感覺仍然空空如也。半是懸想過高，半是自覺未逮，這種矛盾的心態相信是一個心性一直發展的青年所必然有的現象，但是，臨睡前的遊思和思考，他深深體會到，在一個到處都是福建話的鄉鎮過了整整二十年後，來到這兒，一年半的讀書和活動，無疑地使他的心志起了一些變化，而這些變化使他更能確定自己生活的目標。

當初又為何選上這個系呢？之乎者也了一年半以後，現在似乎已沒有必要再說出因由。猶記得當年他註冊單主修這個系的課程時，有一位同學跑來和他握手說：「實在很佩服你，的確應該有人為

中華文化的延續而努力，我當初也很想單主修這個系的課程，但始終沒有這份勇氣。」不，不是那樣，他選擇這個系時根本沒有什麼堂皇的理由，更不曾經歷過什麼內心的掙扎或者是心路歷程的煎熬，只覺得應該選擇這個系，所以就選了。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並不多，尤其是年齡越來越長的時候。即使時常會遇到一些不該問的問題也無妨。「中文系？」他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每天高喊維護中華文化卻不知道馬大沒有這麼一個學系。他很想笑，可是他如何笑得出口？「中文系讀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報紙的報導說是以國語教學的，是不是那樣子？中文系學生的出路是不是只能當個中學教師？」這一些問題，他已被問過好幾次了，好幾次了。

社會的趨勢是注重理工商，輕人文。既然生在這個時代，不管好壞，總也得生活在其中，甚至也得有承認這種現象會延續頗長時間的勇氣。因此他絕對了解一些同學在選讀中文系時會經過一段心理的掙扎。曾經有那麼一個譬喻，好像是柏楊第一個先說的吧，「在大學裡，趾高氣揚，走路仿若企鵝抬頭向上的總是理工商的學生，中文系學生走路時，頭總是低低的。」怎麼會有那樣的譬喻？怎麼會那樣子？在一個寒冷的春夜，他和幾位同學在香港和溫瑞安見面的時候，在驪貞酒店裡談文學之餘，也略談了一些大學的生活，瑞安問了一句：「選修中文系時，家裡是否有人反對？」啊啊！都說這是一個重理工商的社會了。他自始至終都知道，文學院的錄取分數是各個學院中最低的，文學院絕大部份的學生都是因為選不到其他的系而進來的，而中文系又曾被人說是文學院中出路最狹窄的，哎哎，似乎也習以為常了。

該怎麼說呢？在寒凍襲人的冷氣圖書館裡讀書，在涼風習習的樹蔭下休息，他常常會忍不住去思考這些問題。讀中文系難道一定

就得和錢途掛鉤？當初他決定進入中文系時，根本不曾為這些問題困擾。他景仰的人物絕大部份都是修讀人文學科的，而探討人性本質又是他最大的興趣，當初他是秉著興趣進入文學院，最後仍然以同樣的理由選擇中文系，他有一個信念，只要念得好，他一樣能揚眉吐氣！

讀中文系難道一定就和錢途掛鉤？他知道這其實是價值觀念的問題，能進入大學表示自己在學問上已超越了一個程度，應該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應人云亦云，多人一窩蜂朝著的方向並不表示那就是真理的所在地，社會中以一個人賺錢的多寡來評定一個人能力的那種價值觀念未必是一定就得盲從，他始終認為除了錢財之外，世間值得追求值得他探討的事物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是的，那才是他想要的人生。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各人的解釋不同。他曾經一度迷茫過。從死亡的終站來回望人生，一切似乎都徒勞無功，如夢一場。因此他始終秉著一個信念，來這世界就是要你領略一切，遍嘗一切，然後到最後方能真解其中真味。好的，壞的，照著那一條自己決定的路，照著那一條自己認為最適合的路，照著那一條自己認為最有意義的路，一直向前，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絕不厭倦，絕不厭倦。

## 殘存記憶中的騰躍

### ——馬大華文學會籌委會點滴

馬大有大學湖，湖上有荷葉，這是校園中最優雅的景色。每一天，總有許多學生得經過這裡，湖水多少歲了，沒有人在意。每一年，它目視一批學生進來，每一年，它又目送一批學生離去，湖水寂寂，在風吹的波紋中領會著每一個學生的快樂和傷感。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李偉杰打電話告訴我，說校長已經召見他們，華文學會可以正式成立。不久，楊秋美和黃仲賢先後來電通知我這個消息。不過籌委會打算拿到正式批准書時才向同學們公布這個佳音。經一事，長一智，大家已經吃過了一次苦頭，知道過早的興奮將會帶來長久的失望和傷感。事實上，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副教長所宣布的馬大華文學會已經成立而事實上卻不是那麼一回事的騙局，還在我們腦海中苦鬱的久久不散，因此籌委會同學處理華文學會事件時自然不得不小心翼翼。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校長 Ungku Aziz 皇家教授親自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馬大華文學會正式成立的消息。當時許多學生都逃課趕往現場，這一回肯定是真的了。沒有一個學生不百感交集，靜靜地想一想，心裡總還是有一絲絲的不甘心，為什麼要等十二年那麼久呢？但是能夠成立，一切一切的不快都會拋在腦後的。去者已矣，我們要關心的是華文學會的將來，但是啊但是，在華文學會

籌委會裡頭活動過的人，誰不會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歷程？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從南部的一個小鄉鎮來到馬大讀書。九月十六日，第一次出席了馬大華文學會籌委會召開的常年大會。早在開會的一個星期前，在任的秘書劉安敏希望我能協助爭取華文學會的成立，在當時籌委會的改選中競選秘書。我一進來馬大以後，就不斷地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收集爭取馬大華文學會成立的資料，總是一頁又一頁令人嘆息的辛酸。我不假思索地告訴他，如果能夠勝任的話，我的大學生活願意和學會的爭取工作一起並行。那年，我是四名執委中唯一的一年級代表。

在籌委會的生涯裡，所感受的快樂和憂傷，一萬字雖未言短，十萬字，甚至是百萬字又何能盡意？我的大學生活假如沒有華文學會籌委會的點綴，肯定是空白無味的一章。那兩年，讓我長大，在因循錯誤交織的華裔社會裡，肯定了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

我曾經聽過一位比我早的華文學會籌委會代表說起，許多人進入籌委會主要是爲了有機會認識一些達官顯要，進而爲自己將來畢業時尋出路。是不是那樣，當然很難說。但在我擔任執委的兩年裡，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們有著共同的方向。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同把華文學會爭取成功。兩年來，所見的達官貴人不少，華裔所面對的難題堆積如山，華裔頭頭缺乏他們應有的權威性。這話說與不說都一樣，反正大家都心知肚明。和這些人交談以後，當然更能進一步知道華裔地位低落的由來，以及華族難題發生的必然性。馬大華文學會事件會被拖得那麼久，總括一句，官官不是不爲，事實是有心無力。

其實在學會翻滾過的人，誰不知道箇中原由。一九八六年七月六日，我們在不得已之下登了一篇陳述馬大華文學會事件的文章，

由我執筆，籌委會經過一番討論後，決定發表。那幾天真的是夜夜難眠，我記得將稿交給《南洋商報·言論版》編輯時，心裡仍然忐忑。刊出以後，華文學會事件會有怎樣的發展？籌委會同人又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我們無從預料。范利宜打電話來給我，他也睡不著，於是我們在電話中聊至深夜。殷代伯夷的故事我們是知道的。伯夷反對周武伐紂，因此「義不食周粟」，逃到首陽山「采薇而食之」，結果餓死山上。我們覺得有時候是應該勇往直前，做一些認為應該做的事。事實上，我們並無意苛責任何人，我們只是在陳述一件事情的經過。我們的立場是：你站在台上，你一定得將自己的角色演好，不管多麼難演，你一定得盡力將它演好，要不然就是失責。用任何理由來搪塞都不是強者的行爲，也不是我們所看得起的。一九八六年華文學會籌委會的常年大會，我們又何嘗不是抱著那樣的心理。這是我第三次出席大會，第一次我在台下，出席者有三百人，第二次我在台上，出席者有五百多人，第三次我也是在台上，出席者超過一千人。面對那麼多關心華文學會的同學，心情自是內疚，在長達半小時的致詞以後，我就一直在等著同學的刁責，那其實也是應該的。但是令我們感動的是，不管是致詞或者是同學的發問時間裡，我們得到的都是一陣陣的掌聲和鼓勵。我幾乎要帶淚地感激同學們對籌委會那麼的信任。我們深深地體會到，在華文學會事件上，華裔同學是多麼的團結，我們是多麼的殷切要得回我們原本很早就應該得到的東西。

身為籌委會的執委，壓力自然是很大的。每一次遇到同學，總會遇到一個問題：「學會爭取到怎樣了？」他們的臉上總是企盼一個答案，總是希望我們的眼鏡背後能散發出一個有光采的眼神。一些同學總是殷切地提出他們的建議，譬如他們在煩不勝煩的時候會

說：「我們去法庭起訴有關當局不批准學會的成立，我們去示威抗議，我們去召開記者招待會，我們去絕食哀哀……。」這樣的建議雖然缺乏冷靜而理智的判斷，可是他們的出發點卻是誠懇的。有的時候我們也會覺得煩倦。我們為自己每一次都給相同的答案而煩倦。因此常常會想說：罷了，罷了，乾脆做一個沒有意識的大學生算了。可是「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啊。偶爾在翻讀久不曾觸及的書本，興趣正開始轉濃時，一個問題會冷不提防地跑進來，華文學會現在的進展，該用什麼對策去應付呢？

「大學生是象牙塔裡的書呆子。」說這種時髦話的人很多，已懶得去辯護了。華裔社會人士一向只關注大專學府學額的爭取，對於大學裡所發生的一切事物，從來不曾主動關心過，總以為能進大學的華裔子弟都是天之驕子。將他們送到裡面，他們就應該心滿意足了。殊不知大學對社會思潮有著帶頭的作用，是栽培國家民族領袖的最佳場所。而華文學會的成立，更能在訓練華裔社會領袖方面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不過在爭取華文學會的時候，外頭的華裔人士從不曾主動援手卻也是事實，他們忽略了很多問題，自然也不會過問當一名學生還在大學就讀時，是否應該讓他們奔奔波波，周旋於政治人物的圓滑？他們的時間是否能夠負荷？他們的得失又如何判斷？籌委會同學當然不會計較得失，他們只是在觀察和探討中盡個人的責任。可是身為執委，總會忍不住想要追問，那麼多的熱心人士跑到那裡去了？他們當然希望外頭有人關注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尤其在他們渴望得到協助的時候。

若說大學是現實社會的縮影，馬大無疑是最好的代表。它最大，歷史最悠久，又座落在首都，而且種族比例又最能代表我國多元化的社會。馬大華裔學生團不團結，很難給一個評估。不過有一點和

華社一樣，一有競選，競爭總是異常激烈。一九八五年我讀二年級的時候，華文學會籌委會改選時就發生一些事情鬧得不太愉快。當時真的是對這一代學生搖頭，更對華社前景憂慮，一個籌委會競選尚且爭得你死我活，成立以後豈不是不堪設想？夫復何言。事後我才發覺自己的看法太過武斷，因為競選過後，不同陣營的同學又和睦相處，我們共同的願望使我們的心連結在一起。事實上也是那樣，常常籌委會執委開會的時候，在尋求對策時總是看法紛紜，可是在開會討論過後，大家只剩下一個共同的意見。這常使我想起艾森豪寫邱吉爾，艾森豪說邱吉爾在討論過程裡，總是固執己見，一再提出自己的方案，不肯罷休，可是一旦通過了別人的議案，邱吉爾就會全力以赴，一意執行。假如在馬大，我有學習到一絲絲民主的氣息，知道民主的氣度在處理事物的重要性，這一點一定是來自馬大華文學會籌委會。

一九八六年的大會裡，在向一千多名學生致詞以後，同學們的反應真的是令我有想多當半年執委的衝動。但事實畢竟是事實，我不想工作進行到一半時因為畢業而不得不卸任，更何況還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等著要我去處理。另外一點，在籌委會的兩年裡，一些沒有當執委的同學也和我們一樣爲了爭取學會的成立而付出了許多的時間和精力，那的確使我們感觸良深，在每一個人都能當領袖的大學裡，如果大家都想站在前線出鋒頭，令人懷念的籌委會就不復籌委會了。什麼時候該扮演什麼角色，就去扮演什麼角色，最重要的是，能夠燃燒的時候絕不讓自己滅跡，這絕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籌委會的工作是富於挑戰性的。我幾乎可以肯定的說，我們在籌委會裡尋得了許多課本永遠尋找不到的知識，雖然在任時期，花在課本的時間會比其他同學少，成績因此受影響，可是若要我們重

新抉擇，籌委會同學必然會願意再度回到他們自己的崗位。責任是大了一些，可是回報更多，你永遠感覺到延續中華文化的熱血是無止息的，永遠有那麼多人與你同在，你不會感到孤獨，一切都充滿了希望。

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馬大華文學會終於開始她的第一屆常年大會。在一千多名學生興奮的掌聲中，我代表執委會贈送華文學會生日蛋糕。步行的時候，心裡突然閃起了英國詩人鄧約翰的話：「你是圓規的立足點，我游動轉移，可是我的靈魂永遠傾向你不游移的那一個定點。」

對三千多名華裔學生來說，華文學會籌委會或者是華文學會都是圓規的立足點。經過他們群起努力、追求、尋找，華文學會終於在馬大成立起來，由於他們的永不退卻，不屈服，後一代的馬大華裔學生終於不再感到苦悶和寂寥。

## 只緣身在此山中

四月的時候，校園是靜悄悄的。去年此刻，是我完成大學課程的時候。我們考完最後一張試卷經過停車場，大家都沒有說話，心裡也不知是快樂還是傷感。我忽然感覺停車場裡的幾棵樹是夠寂寞的。看了一批又一批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現在連我們也要向她道別了。我真的希望能瀟灑地揮一揮手，可是心情卻不知爲什麼一下子空虛了起來。

像是失落了什麼，又像獲得了什麼。通常是下午三點十五分，我坐在食堂裡喝著咖啡，想著一些怎麼樣也揮不開的事情。文學、哲學、音樂、愛情，不能把握的就必須從容地放棄。第一次走來文學院時，什麼人也不認識。別人讀大學時是興高采烈的，我臉上卻布滿了淡淡的哀愁。食堂裡人聲吵雜，我想盡快離開，卻又不知道到那裡打發整個下午。我坐在那裡追思一個不能挽回的決定，心中想著放棄台大走入馬大是不是最佳的抉擇？那段日子是夠難挨的。家人不了解我的思想，該從何說起呢？我是狠不起心瀟灑地飄洋過海。我是他們最疼愛的小兒子、小弟弟，他們捨不得我離開。親情有的時候是難以理喻的，關懷更是沒有什麼標準可以依循。母親病了好幾年，她的眼淚是我所不能忘記的。

馬大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漸漸地我就喜歡上她了。一個很有氣質的女同學告訴我，漫步伊坦大門的小徑是很好的享受，涼涼的樹蔭，秋天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又有一個女孩子說，晚餐過

後在大學湖旁散步，綠水無波，心情特別寧和，功課的壓力不自覺就會鬆散。馬大的確是有許多讓人留連的地方。我懷念的就是這種隨隨和和的生活方式。不管別人怎麼說，每次我回溯大學的日子，並沒有輝煌轟烈的想法，記得最多的是文學廣場裡零零星星的片斷。午餐過後，我喜歡在那裡聊天，有時候為一些文學觀念的小問題和同學爭辯。但我更加喜愛和女同學抬槓生活中的一些小細節，作弄她們也讓她們作弄。一年級的時候，上課和逃課的次數一樣多。逃課定會自責，上課卻又無心聽講，總是想著書籍以外的事情。那時候的使命感比什麼都強，參加華文學會成立的爭取工作，又協助三年級同學籌辦一個港台考察團，一年級的精神就全部傾注那兒了。每天奔奔波波，大考過後方才心驚膽跳，整整不安了兩個月。二年級時一樣不甘寂寞，但開始能夠利用時間溫習功課。現在我經過文學廣場，經常在人聲吵雜中彷彿看到從前的自己，也不知應該淡忘還是珍惜。當我追蹤記憶，始終無法肯定這樣的生活方式是否有意義。事實上，生命中有許多不必追問的因由。有一些時候，有一些路是必須走的。

是應該如此的，就好像選擇中文系一樣。在中學裡，茫然了幾年，失落了幾年，無助了幾年，到了這裡，心靈才真正地安定下來，那是生命中一個重大的轉捩點。我慶幸自己能夠徜徉裡頭。當初也曾想過選擇聲光化電，避開疲憊的人文思索，但個性畢竟不允許。我是屬於中文系的，我告訴自己。這幾年裡，我學到中學課堂裡闕如的古典和生命，追溯幾千年來人類的思維。不過我真正珍惜的，卻是從領悟到一種關懷、一種愛、一種活力、一種良知，我默默地思索生命的意義。三年級即將畢業的時候，我在電視台裡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個時事節目裡又是訪問又是主持，有一位導播說我以後

可以接過她的棒子，我不知道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可是它卻令我不安與疑慮，讓我有遠離學院、遠離書卷的感覺。學院式的生活影響我太深了，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在職業與方向上不能有原則性的修改。三年裡，獲取的知識只不過是滄海一粟，一切只不過剛剛開始。於是我要求留了下來，放棄外頭的召喚。只有在中文系，才能掩埋我內心的波瀾和寂寞。

對於這一切，我心中一直存著些許感激之情的。我唯一的希望是中文系永遠都能安然無恙。同學們來信，很羨慕我的機緣，能夠繼續沉緬在學術的奧秘，爬步在沉實而有力的導引裡。然而人生路長，關於時間、關於生命，是不是一直能夠祈求恆久的固守呢？我是沒有把握的。每天我來回文學院，在研究室裡忙著許多要做的事情，趕著許多要讀的書刊，波瀾壯闊的思想令人嚮往，白首下書帷的精神使人敬佩，精神上的壓力因此更大。有一天午餐過後我回到研究室，門縫裡夾了一張兩位同學寄來的生日卡片，才驚覺這一日過後就是二十五歲了，心裡不知是悲是喜。我望向窗外，一輛小轎車正駛過馬來文學系旁的小路，日頭越來越熱了。恍惚間忽然有一種天地之悠悠的意念，心裡驟然增添了許多歲月，我感覺到時間的壓迫，越來越急促。旁騖太多，我渴望專心一致，急躁的心理讓我煩憂，但我所掌握到的東西，確確實實比我企盼中的少得太多了。

這一切讓我難過，卻也使我比較積極進取。雖然在精神上有的時候覺得好累，但我喜歡這樣的生活。每天穿梭於校園之間，下午喝一次茶，一個星期看一場電影，兩個月回一次家，偶爾和朋友爭辯一些文化上的枝節問題，就這樣平淡。去年如此，今年亦復如此，希望明年也如此，以後永遠也如此，在寂寂的早晨和午後，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就這樣平淡，讓日子平淡而充實地過下去。

## 疏忽了的關心

大學生是天之驕子。

沒有人會反對這句話，尤其是華裔社會，在「固打\*」制度下，身受其害而被犧牲的學子可說不計其數。對於不幸的人，我們時常都會打抱不平，我們的關心也是自然誠懇的。因此總有許多社會人士會不斷地為爭取增加大學名額而努力，大家都希望能讓多一點有資格進入大學的人進入大學就讀。

但是幸運的這一群人走入了大學又怎樣呢？

華裔社會的觀念是：能將他們送入大學，他們應該已心滿意足，是不應該再有什麼奢求的了。因此華裔大學生的心態如何？他們在大學如何度日？大學的制度如何？在種族比例有差距而學生又有種族兩極化的傾向時，他們如何自處？大專法令的內容是什麼？學生會又是怎麼樣的組織？為什麼當今許多政壇的頂尖領袖都是出自學生會？一大堆的問題需要我們去探討，但是大部份的華裔社會人士都回答不出，事實上他們似乎也不想去回答。

大學裡實在是有太多的事情社會人士不了解。好比最近在馬大發生的「選修科事件」，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單主修、雙主修、選修的分別。能針對問題而談的人不多，即使許多發表言論的政客對大學的事務也不甚了解，人云亦云，結果將事情弄得更糟，無益於實際。

以前筆者還是馬大華文學會籌委會的負責人時，就有一位馬華

部長一直弄不清「華文學會」和「中文系」的分別。我們已經糾正他好幾次，可是他仍然說：「你們所要爭取的中文系學會，我會盡量替你們想辦法。」

這實在是一件令我們感到恥辱的事。我們重視大專院校的存在，我們承認大學是培育人才的最佳場所，我們為大學名額分配的問題憂心忡忡，但是我們卻不了解裡頭的許多事情。關心華人教育的人士如此，其他人更不用說了。我們反對這，反對那，卻沒有好好認真地去研究和探討問題的本身，無法提出強而有力的反對理由或者是方法，結果問題還是問題，有的時候甚至還因而產生了我們不想看到的更多問題。

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外頭所發生的一切，必然會影響裡頭。外頭發生什麼，裡頭必然也同樣會發生相似的事情，華裔有許多欲語還休的困境，華裔大學生又何嘗不為自己在大學裡的困境困擾。假如社會人士好好去探討華裔大學生的生活本質，必然會有許多事情讓他們瞠目結舌。什麼樣的社會，就會有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環境，自然也會產生什麼樣的大學生。

我們應該關心大學生的生活，他們無所適從的時候實在太多了。

[\*編者註]：原本實施績效制的一九六〇年代，馬大（當時唯一的大學）的土著（馬來人）入學比例在 20% 以下。經過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種族事件之後，政府重新擬訂新經濟政策，國會並於一九七一年通過《聯邦憲法》新條文 153(8A)，確立種族固打制（Quota），實施一套按各民族人口比例（而不是單純根據考試成績）進行入學配額的制度，以保障馬來人的大學升學權益。土著與非土著的大學生比例逆轉為 64%：36%。一九七九年，在華裔最大的政黨「馬華公會」的爭取下，調整為 55%：45%（華裔學生佔 35%，其餘為印裔及其他少數民族）。

## 疲憊的心靈

「寧戀故鄉一撮土，莫貪他鄉萬兩財」。

華人一向安土重遷，從故鄉遠離，眼淚往往會奪眶而出。移民絕對不是這個民族愛做的事。我們愛罵移民者為不效忠，那樣大頂的帽子一套上去，很多時候是讓人百口莫辯的。事實上也是如此，假如你真的愛這個國家，那為什麼你不回國定居？

可是事情往往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簡單，很多移民者的心中都有難言的苦楚。有那麼一個故事，一個在外國住了整十年的學者，修完了博士後，打算回國大展抱負，奉獻他的所長。當然他還有私人的理由：他想家，想得很厲害，一直都不能制止。興致高昂地，他領著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的妻子，回到他日夜眷戀的鄉土，低聲問一句：「曾經孕育過不分你我種族的大地的母親啊，別來是否無恙？」事先，他寫信問過一位朋友，他知道有一所大學急切需要他那樣的「文學博士」。

他終於發現自己太天真了，將祖國的一切想得太美好了。半年下來，積蓄都快花光了，空缺雖然一直沒有人填補，當局卻始終不批准他所申請的工作。他要吃飯，以他一流大學畢業出來的學識，他知道有許多國家他可以前往，生活的充裕是這兒望塵莫及的。偏偏他魂牽夢掛，從薪金來說是屈就的祖國卻給他百般刁難。一個昏昏的午後，他終於興起離國的念頭。他也許不回來了，他真的是失望到極點，默默地一直以馬來西亞的公民為榮，卻不知道他一直堅

持的公民權帶給他什麼好處，他不得不感慨萬千。

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故事，對著這位想要移民的知識份子，我忽然興起一種欲語無由的深嘆。這和愛國不愛國，早已經扯不上關係了。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大家都深切地體會到人才外流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紛紛謀求解決的方法，我們的口號高入雲霄。

可是我們的許多人才還是一直不斷地外流，我們不知該怪誰，只知道我們腳下所踩踏的土地，實在是有太多的事情讓我們心情凝重。

## 苦澀的歲月

獨立了三十年以後，我們的話題還是圍繞在種族極化的圈子裡。我們一直憂心忡忡，但是我們又習慣將精力花在彼此對抗的路子上，我們將一個高潮推向另一個高潮。我們彷彿已經習慣於這種生活，可是十八年前的那件大事，誰能說要忘記就會忘記呢？那慘痛的經驗，我們似乎什麼也沒有學到。獨立了三十年以後，愜愜的午後，我們的話題還是圍繞在種族極化的圈子裡。

大學裡的生活是值得讓你一輩子都活在甜蜜的回憶中。這裡的一切是那麼的美好，繽紛的歲月任你塗抹。二十多歲的人還是屬於無憂無慮的，他們應該延續中學時代的生活，不同膚色的有說有笑，大家一起上課一起喝茶一起聊天，想著美好的明天。

可是這種年齡充斥的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他們開始關心國事。二十多歲的人畢竟是太年輕了，他們容易受到外面社會的影響，他們容易受到煽動，很多時候他們會情緒多於理智，尤其是提到種族權益的時候，這一切該怪誰呢？

因此很多時候我們都無法展顏歡笑。記得有一年馬大學生會改選的時候，我往計票中心去。雨剛停後不久，非馬來同學站在一邊，馬來同學站在一邊。成績一項接著一項慢慢地公布，那裡頭卻有讓人目瞪口呆，忘記了置身什麼時代什麼地方的感覺。馬來同學當選，歡呼聲便在他們族群中久久不散，非馬來同學俯首嘆息；非馬來同學當選，屬於他們的族群便興高采烈，馬來同學則低頭默默。從來

沒有一位學生能在他族佔大多數的學院中擊敗對手當選。

過了一年以後，又是學生會改選的時刻。仍然是雨剛停後不久，計票站裡的情形似乎好了許多，不同族群的學生不再分開而站，他們有些還有說有笑，但這是表面的。選舉的結果還是一樣，沒有一個學生能在他族學生佔大多數的學院中當選。

我們憂心忡忡，對著下一代的青年寄予厚望時，他們卻彼此不信任，尤其是校園裡晚近發生的一些事，我們更加擔憂將來棒子交到他們手中時，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事實上，這個國家是一個理想的樂土，絕對沒有人會捨得棄之不顧的，絕對沒有人不想終身眷守著她的。在殖民地時代，我們指責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獨立以後，三十年了，我們似乎什麼也不會嘗試。打開報章一看，盡是種族之間針鋒相對的新聞。冷氣機即使代替了電風扇，心中的鬱悶又豈是能夠被它所吹化的？

我們已經獨立了三十年了。三十年啊，說起來實在是一件令人羞憤的事。